



毛泽东指导我军作战方略的三次转变

□ 夏洪波

不拘泥于一格，因情用兵、因敌用兵是毛泽东指导我军作战的重要特色。革命战争年代的三个不同阶段，毛泽东指导我军作战的方略先后进行过三次具有代表意义的转变，这三次转变为我军摆脱不利局面，夺取战场主动权均发挥了极其重要的作用。

秋收起义受挫后，由夺取长沙向移兵井冈山转变。1927年7月，大革命失败后，我们党意识到了枪杆子的重要性，开始了武装斗争的道路探寻。在没有现成经验可以借鉴的情况下，党内不少领导将武装斗争的重点放在了夺取大城市上。秋收起义前，尽管毛泽东在给中共湖南省委信中提出了“长沙城内暴动必须与前方的军事配合，待我军逼近长沙时方能实行”的建议，但受“城市中心论”的影响，从中共中央到湖南省委都主张进攻长沙。秋收起义爆发后，起义部队虽然作战英勇，但由于敌人在兵力兵器和城防等方面占有绝对优势，因此，进攻不久起义部队就遭受重大伤亡。在这种情况下，毛泽东意识到，起义部队是由正规部队、农民武装、工人武装临时组建而成，规模不大，战斗力十分有限，仅仅攻打县城就受到了重大伤亡，如果继续攻打长沙不仅没有希望取胜，而且很可能导致全军覆没。紧要关头，毛泽东当机立断，决定改变作战方略，令起义部队停止进攻长沙，退到浏阳文家市集中，转向敌人力量薄弱的井冈山退却，从此开始了井冈山革命根据地的艰难创

建。毛泽东这一作战方略的转变，是我们党把马克思主义关于暴力革命的原理与中国具体实践相结合的初创性探索。转战井冈山在当时是秋收起义部队受挫后面临进退两难困境的最优选择。尽管我们党在当时知道了枪杆子里出政权的道理，但并不知道采取何种途径夺取政权。毛泽东的这次作战方略的转变为我们党在力量弱小时将革命斗争重心由城市转向农村提供了重要的现实依据，为全国革命斗争形成星火燎原的良好局势开辟了一条全新的道路。

抗日战争初期，由在山西一地作战向多地分散展开的转变。抗日战争爆发后不久，国共合作抗日，我党领导的红军改编为国民革命军第八路军。根据国民党政府在1937年8月初召开的国防会议决定，八路军全部开到前线，独当一面与日军作战。同月，在中共中央召开的洛川会议上，毛泽东强调指出，抗日战争是持久战，当前日本进攻的主要方向是华北，我军的主要作战任务是在晋察冀三省交界处创建根据地，保存和扩大红军，在战略上配合友军，钳制和相机消灭敌人。会议最后决定，八路军主力开赴山西恒山前线，主要集中在广灵、灵丘等地区作战。在八路军即将在恒山一线展开战略部署之际，日军华北方面军以平汉路沿线为主要突击方向，方略以大迂回姿势，夺取太原，进而夺取黄河以北。在此情况下，恒山山脉必将成为日军进攻的重点方向。如果我军仍集中在恒山一线，必将陷入日军的重兵包围之中。根据敌情变化，毛泽东指导八

路军及时转变了作战方略，由在晋东北一地集中作战向在山西四角分散展开：第115师一部在晋东北，依托恒山山脉进行战略展开；第120师转至晋西北，依托管涔山脉进行战略展开；第129师主力和第115师的第344旅赴晋东南，依托太行、太岳山脉进行战略展开；第115师师部及八路军总部机关赴晋东南，依托吕梁山进行战略展开。毛泽东这一作战方略的转变，就国共关系而言，是冲破国民党限制的独立自主的作战行动；就对敌作战而言，既避免了我军被日军分割包围的危险，又保存和发展壮大了自己，沉重地打击了日军，盘活了中国抗战的棋局，使敌后战场逐步上升为全国抗战的主要战场。

解放战争反攻阶段，由渡江南进向暂缓渡江的转变。1947年6月30日，刘邓大军千里挺进大别山，正式拉开了解放战争战略反攻的序幕。同年12月，在陕北米脂召开的十二月会议上，中共中央作出了“打倒蒋介石，解放全中国”的战略部署。1948年1月7日，毛泽东电召陈毅到陕北商讨关于粟裕率领华东野战军3个纵队渡江南下作战的问题。在毛泽东筹划该方略之前，粟裕认为，要从根本扭转中原战局，最佳的办法就是集中兵力在中原地区打大歼灭战。经过慎重考虑，粟裕在1月22日给中央军委的电报中汇报了他的战略构想与建议（即著名的“子养电”）。收到粟裕的电报后，中共中央进行了复议，决定坚持既定渡江南进的方略。在复电中，毛泽东对渡江南进的时机、地点等提出了各有利弊的三个方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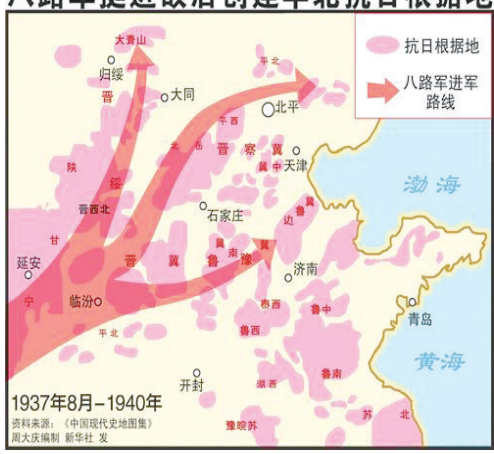
让粟裕“熟筹见复”。收到电报后，粟裕再次对渡江南进的作战方略进行了深入思考。经过慎重思考，粟裕于1月31日第二次致电中央军委，认真回答了中央军委要求“熟筹见复”的关于渡江南进的问题，同时重申了留在中原打大歼灭战的理由。对于粟裕的第二份电报，毛泽东再次与陈毅进行了研究，还是决定坚持原来的方略不变。陈毅从陕北返回之后，粟裕在向陈毅汇报了自己的考虑，并征求刘伯承、邓小平等领导人的意见之后，于4月18日第三次致电中央军委，再次提出暂不过江，集中主力在中原打大歼灭战的建议。毛泽东接到粟裕电报后，一方面复电陈毅、粟裕来中央当面商定，一方面又致电在西柏坡的刘少奇、朱德、周恩来、任弼时，提议召开中共中央书记处会议，讨论“陈粟兵团的行动问题”。在会上，毛泽东等中央领导认真听取了粟裕关于暂不渡江南进的详细汇报。经过中央书记处深入研究之后，毛泽东最终采纳了粟裕的建议，同意暂缓渡江南进，先集中兵力尽可能多地在中原地区歼灭国民党军，然后再南渡长江。毛泽东的这一作战方略的转变，为华东野战军在中原战场积极捕捉战机，大量歼灭敌人有生力量，迅速改变中原战场的敌我力量对比、创造了有利条件，对此后形成和实现“淮海战役设想的最初蓝图”、加速解放战争进程起到了重要的促进作用。

军事历史

湘赣边秋收起义和向井冈山进军要图



八路军挺进敌后创建华北抗日根据地



训练距离实战还有多远

□ 聂 征

“言武者，练为最要”。党的十九大明确指出：军队是要准备打仗的，一切工作都必须坚持战斗力标准，向能打仗、打胜仗聚焦。当前，国防和军队建设正站在新的历史起点上，面对国家安全环境的深刻变化和强国强军的时代要求，军队必须全面贯彻习近平强军思想，深刻把握实战与训练的内在关系，大力开展实战化训练，全面形成慑战、止战、胜战能力，为国家全球战略布局提供有效支撑。

知战与备战的统一

知战才能确保备战的正确方向。人类战争史告诉我们，如果一个国家、一支军队不能科学预见下一场战争，有效组织战备训练，接踵而来的往往是国家和民族的灾难。二战前，法军过于看重一战经验，围绕马奇诺防线开展战备训练，对于坦克集群的快速突击能力没有引起足够重视，最终在德国法西斯的“钢铁洪流”碾压下兵败如山倒。可见，偏离了对明日战争的正确认知，而孤立僵化地组织训练，无法赢得作战胜利；惟有紧贴任务变化，以时不我待的精神状态去探索“明天的仗会怎样打？”，才能增强备战的针对性，实现“慑战、止战、胜战”目的。

备战需要在知战的牵引下不断挑战极限。狭路相逢勇者胜。只有不断挑战极限，才能抢占制胜先机。国防大学原校长邢世忠上将在回忆录中描述：对越自卫还击作战之前，师里组织临战训练，师长边贵祥要求部队上半年每天一个5公里，下半年每天一个10公里，雷打

不动。当时有很多同志不理解，认为临战训练的重点应该是战术编组、战法运用和战斗协同等，光跑步起什么作用啊？后来的战斗证明，在中越边境的热带雨林地作战，对参战官兵的体能是一个极大考验，正是因为这种扎实的极限训练为官兵打下了坚实的体能基础，在战斗中极大地减少了伤亡，跑都跑赢了越南兵。作为战争制胜决定因素的人，不仅需要挑战自身体能极限，还需要在人员结合训练中不断挑战极限。1982年英阿马岛之战前夕，阿根廷飞行员苦练“超级军旗”攻击机超低空飞行，最终以一发20万美元的导弹，击毁了造价2亿的“谢菲尔德”舰舰，创造了人类有史以来第一次以导弹击毁战舰的战例。事实表明，虽然飞行手册注明“超级军旗”战机的最低飞行高度是80米，再低就是玩命。可为了突破“谢菲尔德”号的雷达防御，阿根廷飞行员始终坚持将飞行高度降至离海平面30米甚至10米，练就了超越装备极限性的过硬本领，最终一战成名。随着大量新型武器装备的陆续列装，加速磨合。迫切需要在实战压力下开展极限化、高强度的实战化训练，挖掘人员与武器装备的作战潜力。

训道与练法的统一

“训道”主旨在于凝聚军心士气，激励战斗意志，引导官兵把心思和精力放在能打仗、打胜仗上。抗美援朝战争为什么志愿军这么能打？很重要的一个原因就是团以上的指挥员95%都是参加过长征的红军

战士。我军已经几十年没有打仗，人员构成独生子女比例较高，人员思想受多方面冲击影响，训道较之以往面临更加严峻的挑战。为此，应把训道置于练法之前，首先解决“我要打仗，我要备战”的问题；再将训道寓于练法之中，进一步转化“要我打仗，要我备战”的消极因子，使官兵从思想根源实现“要我练”到“我要练”的转变。具体来讲，一是要坚定信仰，增强官兵使命感，认清党是维护国家统一和民族富强的基石，是每个家庭幸福生活的保障，自觉知党恩、听党话、跟党走。二是要政策激励，激发官兵荣誉感，提高军人社会地位，使官兵在精神上有了自豪感，物质上有满足感。三是要岗位训道，增强官兵责任感，通过思想教育引导官兵认清小岗位联着大任务，具有大作用，是体系作战不可替代的重要一环。

“练法”核心在于聚焦实战需求，破解训组难题。实战的目的是打赢，实战化训练的目的是学会实战技能、提升实战能力。为此，要在训练中实现逼真模拟实战和遵循能力生成规律的有机统一。一是要练军种联合之法，加速实现各军种装备性能与官兵技能亟须在训练中加速磨合。迫切需要在实战压力下开展极限化、高强度的实战化训练，挖掘人员与武器装备的作战潜力。二是要练兵种协同之法，在现行协同应该的基础上，重点规范协同时“应该做什么，而不是怎样做”，在保证军种内部各兵种之间精确协同的同时，赋予各级指挥员更大的自主权。三是要练打军基础之法，着眼信息化战争对官兵体能、智能、技能提出的新要求，从难从严抓好基础训练。

继承与创新的统一

继承是一支军队精神的传承和经验的传递。精神传承变了味，军队的性质也会发生变化。苏联解体、东欧剧变从某种意义上言均是军队的精神传承出了问题。经验过了期，如果不能及时更新，军队就会打败仗。第一次车臣战争中，俄军精锐部队第131旅对城市巷战困难估计不足，战前没有进行有效的战备训练，在格罗兹尼苦战三天两夜，近乎全军覆没。可见，继承不仅是一支军队不忘初心、永不褪色的保证，也是军队在上一场战争与下一场战争的间歇期对以往作战经验的主观定位。定位准确，训练就会少走弯路，把更多的时间和精力投入到创新发展上来；定位不准，训练就会偏离方向，平时训起来事半功倍，战时打起来教训惨痛。

创新是在继承基础上的优化完善和自我否定。对现行训法的优化完善和自我否定有两条依据：一是部队的实际情况。创新不能影响部队正常按纲施训，但也不能以此为抱残守缺，而是要结合军队编制调制调整改革后的新变化主动创新，不断赋予传统训法新的内涵，保持军队传承的鲜活生命力。二是打赢的客观要求。创新应紧密结合不同战略方向、不同军种部队担负的具体任务，科学分析“打赢”对各级各类部队的个性化能力需求，使全体官兵均能对照为自己量身定做的训练标准，在训练中查找短板，积极应变，锐意创新，形成上下联动、全员融入的训练创新氛围。

军队建设

党的十九大报告指出：“加快军事智能化发展，提高基于网络信息体系的联合作战能力、全域作战能力，有效塑造态势、管控危机、遏制战争、打赢战争。”把加快军事智能化发展写进党的报告，体现了党中央、习近平主席对发展军事高科技的高度重视，势必推动军事智能化向更高更精更尖的方向快速前进。

军事智能是人工智能的一个分支，无论怎样前沿的军事智能，都是人类探索研究发明的结果，必须也理应始终受到人类的控制。而事实上，人工智能能否始终臣服于人类，一直备受质疑。美国著名科幻作家艾萨克·阿西莫夫在1942年发表的作品《我，机器人》中明确提出“机器人学三定律”，要求机器人忠于人类、保护人类，这虽然是一个文学概念，但却是人类最早提出人工智能存在摆脱人类控制可能的担忧。实际上，人工智能发展到一定阶段，其能力确实大大超乎人类意料。比如观察、分析能力，快速计算能力，下定决心能力等，这些能力人类远不及人工智能。

人类在探索研究人工智能的道路上也一直以自己的产品进行智力较量。1997年5月11日，IBM“深蓝”的电脑击败了国际象棋世界冠军卡斯帕罗夫的人脑，证明了在有限的时间里“计算”可以战胜“算计”；2016年、2017年的人机围棋大战，更加证实了人工智能的巨大魔力。在军事领域，从海湾战争到叙利亚危机，美国、俄罗斯都派出了高度智能化的战场机器人参与战争，这些机器人深入核心战区近距离侦察，然后分析战场情况，将数据提交给后方的指挥部下达军事行动决心。

科技是核心战斗力，人工智能是核心军事科技。加快军事智能化发展，提高打赢战争、遏制战争的能力，是各国在军事科技中追求的重中之重。我们看重军事智能，主要是因为军事智能化可以让人类的战争产生倍增效应，实现这一目标的前提就是，军事智能必须要接受人类的控制和指挥。有些人可能不解，再高级的武器也得由人类操作，再先进的科技也是由人类发明，人工智能还会不受人类控制？其实，这种可能确实存在。

（上接1版）

坚持人民至上，必须贯彻党的群众路线。群众观点是党的根本观点，群众路线是党的根本工作路线。要把党的群众路线贯彻到治国理政全部活动之中，为巩固党的执政基础和执政地位提供了根本工作方法。要大力弘扬密切联系群众这一党的优良传统，坚持深入实际、深入基层、深入群众，开展深入细致的调查研究，积极探索新形势下群众工作的规律和特点，知民情、解民忧、纾民怨、暖民心，密切党群干群关系，始终保持党同人民群众的血肉联系。

坚持人民至上，必须把人民满意作为价值取向。我们要坚持把人民群众的小事当作自己的大事，从人民群众关心的事情做起，从让人民群众满意的事情做起，带领人民不断创造美好生活。群众意见是一把最好的尺子，我们必须把人民拥护不拥护、赞成不赞成、高兴不高兴、答应不答应作为检验一切工作得失成败的最高准则，把人民群众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作为党和政府工作的根本目标，把提升人民群众幸福感、满意度作为工作的主攻方向，始终代表和体现人民利益，真正做到为民、务实、清廉。

切实肩负起以人民为中心的历史责任

坚持人民至上，必须将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体现在经济社会发展各个环节，真正做到老百姓关心什么、期待什么，党和政府就抓住什么、推进什么，通过改革发展给人民群众带来更多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推动老工业基地全面发展。

坚持把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贯穿统筹推进“五位一体”总体布局全过程。“五位一体”总体布局体现了顶层设计与现实需要和人民期待的高度契合，根本上是为保障最广大人民根本利益而作出的战略部署。立足经济社会发展实际，要牢牢把握发展第一要务，坚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围绕建设现代化经济体系，加快推动经济结构调整和发展方式转变，着力解决好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矛盾，增进人民福祉；坚持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发展道路，着力发展更加广泛、更加充分、更加健全的人民民主，促进社会公平正义，保障人民群众合法权益，让人民真正成为城市的主人；坚持以高度的文化自信、强烈的文化意识指导城市规划建设管理，弘扬城市精神，塑造城市特色，不断提升城市综合

国防视点

军事智能

要突出人的作用

□ 张凤坡 黄巍

著名物理学家霍金预测说：“人类在地球上的寿命将只剩下一百年。”霍金这句话不是说一百年后人类就会在地球上消失，而是随着人工智能的发展，机器将不再仅仅是辅助人类的工具，而会在认知性任务的指挥和管控上彻底取代人类。再能“算计”的人类也算不过会“计算”的智能技术，智能产品一旦摆脱了人类控制，必然会给人类带来许多意想不到的麻烦。

军事智能化程度越高，代替人类完成任务就越广泛。对于多数国家来说，军事智能还仅仅处于起步阶段，即使军事智能发展较快的国家，受美国第三次抵消战略影响，也希望在军事智能上实现突飞猛进。任何事情都有两面性，如果仅满足于推动军事智能发展，而不注重把人的因素牢牢镶嵌在军事智能指挥运用的中心环节，人类必将会付出惨重代价。

实力和核心竞争力；坚持以保障和改善民生工作、加强和创新社会治理为重点，加快完善社会建设体制机制，以改革的办法解决人民群众切身利益问题，使人民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全面提升；坚持把良好生态环境作为最普惠的民生福祉，不断满足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优美生态环境需要，向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前进。

坚持把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贯穿深入落实新发展理念全过程。以人民为中心的思想是新发展理念之魂，确立了新发展理念坚持的基本原则。坚持人民至上，实现人民幸福，必须把创新作为引领发展的第一动力，努力建设国家创新型城市，推动发展加速向创新驱动转变；把协调作为共建共享的内在要求，注重处理好区域、城乡、国有与民营等重大关系，实施好乡村振兴战略，不断增强发展的整体性和协同性；把绿色作为发展的本色和底线，认真践行“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思想，努力形成节约资源和保护环境的空间格局、产业结构、生产方式、生活方式，还自然以宁静、和谐、美丽；把开放作为造福人民的战略选择，加快构建以平台、通道、枢纽为重点的开放型经济体系，提高利用“两个市场”“两种资源”能力和水平；把共享作为发展的最终目标，坚持在发展中保障和改善民生，探索完善社会保障、居民增收等一系列共享制度，努力让改革发展成果更多更公平惠及全体人民。

坚持把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贯穿加快老工业基地全面振兴发展全过程。以人民为中心，要靠实践检验。我们将始终坚持发展依靠人民、发展为了人民，着力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按照“优化一产、抓牢二产、提升三产”的思路，积极促进传统产业品牌化、支柱产业高端化、新兴产业规模化，促进产业融合发展，推动实体经济发展和新兴产业培育，加快经济结构调整和产业升级步伐，不断提升经济发展水平；坚决打赢脱贫攻坚战，坚持全面建成小康社会“一个都不能少”的原则，实施稳定脱贫，降低贫困发生率，解决好深层次贫困问题，确保脱贫的结果得到人民认可、经得起历史检验；不断提升民生保障水平，解决好就业增收、教育医疗、住房养老等人民群众最关切最现实的问题，抓好城市建设管理，完善城市功能，提升管理水平，改善人民群众工作和生活条件，让城市对外有形象、对内有品质。

（作者系吉林省委常委、长春市委书记）